

廣西出版史志資料

第八輯

廣西新聞出版社  
編輯室編

# 广西出版史志资料

第八辑

广西新闻出版局

出版志编辑室

一九九三年九月

# 目 录

清代前期广西禁书简述.....	陈相因	( 1 )
旧桂系时期广西出版业概况.....	龙 谦	( 5 )
新桂系时期广西书刊查禁年表 .....	陈相因 胡庆嘉	( 26 )
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出版活动 .....	胡庆嘉	( 53 )
建国前广西最大的地方出版企业——文化 供应社简介 .....	龙 谦	( 62 )
桂林抗战文艺期刊概况 (1937年—1945年) .....	胡庆嘉	( 84 )
抗战时期广西的图书杂志审查机关.....	陈相因	(127)
广西人民出版社建社前二三事.....	陈相因	(149)
广西人民出版社五、六十年代美术读物出 版概况.....	周顺杰	(15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华书店大事记(初稿) (1976年—1982年) .....	陆宝琪	(160)
广西出版行政管理大事记(初稿) (1977年—1985年) .....	冯廷杰	(212)

## 清代前期广西禁书简述

陈相因

清代前期，满族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王朝，除在军事上对各族人民的反抗大加征伐外，还在思想文化领域对汉族知识分子实行严密控制。他们罗织文网，大兴文字狱，对不满其统治的汉族知识分子大肆镇压，并对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先后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政策，制造了不少骇人听闻的禁书案，禁毁的书籍更是不胜枚举。其中，发生于雍正、乾隆二朝，在全国产生影响，涉及广西的禁书案就有五起，遭禁毁的书籍既包括那些不符合“大清律例”的“异端邪说”，也包括一些因“挟嫌诬谄、危词邀功、以报私仇”等人为因素而致祸的一般著述。

雍正年间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李绂《广西通志》被申斥一案，就是涉及广西的一起“因人致祸”的典型禁书案例。李绂，字巨来，号穆堂，江西临川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雍正二年（1724年）巡抚广西。他下车伊始，就着手修纂《广西通志》，第二年完成初稿，不久即奉调升任直隶总督而离开广西。“通志”校刊之事乃交由继任巡抚甘汝来完成。书成前后，正是李绂深受雍正皇帝宠信之时，政治上得意之际，故而他在这部“通志”里写道：“我国家威德之广，超越三古。世祖皇帝统一海宇，圣祖皇帝深仁厚泽六十余年，朔南暨讫，三代以来所未有也。今皇上圣明继述，道一风同。”通篇洋溢着对清以来历代帝王文治武功的赞颂。但是不久，因他上疏劾奏雍正皇帝的另一宠臣

河南巡抚田文镜“有意蹂践读书人”，继而与田文镜发生尖锐冲突以后，情况逐渐起了变化。原先，雍正皇帝对两位宠臣之争，本想加以调和，平息事端，但事态的扩展，尤其是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的参预，最终让雍正皇帝认定李绂等人攻诘田文镜是在搞科目人朋党，致使他深陷当时的“科甲朋党案”中。李绂既已失去了雍正皇帝的器重，打击惩治便接踵而来。雍正四年（1726年）李绂被调离直隶总督要职，改任工部侍郎后，随着“科甲朋党案”的不断深入发展，他的处境是每况愈下。雍正五年（1727年）李绂被罢官、下刑部、交议政大臣会审。朝廷内外大臣便乘机全力罗织“莫须有”的罪名栽赃其头上，将他在直隶、广西任职期间的“新帐、旧帐”一并清算，加以陷害。本来，他主修的《广西通志》刊行后，颇受好评，与“科甲朋党案”扯不上丝毫关系，然而身为朝廷重臣的大学士蒋廷锡、张廷玉等人却从“鸡蛋里面挑骨头”——硬是列举了这部“通志”的种种不是，予以上奏，说李绂在书中“率意徇情，瞻顾桑梓”，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雍正皇帝平生极力反对“朋党”，对结党营私者更是深恶痛绝，如今李绂的“科甲朋党案”尚未了结，又有人参奏他修《广西通志》有结“乡党”之嫌，当然不能容忍，于是便抓住此事，借题发挥，以期杀一儆百。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一道“修志”谕旨就措辞严厉地申斥李绂修《广西通志》“率意徇情，瞻顾桑梓，将江西仕粤之人，不论优劣，概行滥入，远近之人皆传为笑谈，如此志书，岂堪垂世”？从而使李绂的这部二百卷皇皇巨制——《广西通志》被列入禁毁之列，此后遂湮没无闻。

到了乾隆年间，全国较有名的禁书案牵涉广西的又有三起。

其一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的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坚磨生诗钞》一书，因含有谤讪皇上，诋毁朝廷的内容而犯案。此案涉及全国不少省份。由于胡中藻曾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月至十四年（1749年）七月任过广西学政，清廷便

将广西列为此案的重点检查地区，谕令广西巡抚卫哲治要严加追查，把其在广西期间所出“试题”及与旁人“偶和诗文”并一切恶迹统统查出，不得姑息。经过卫哲治的严密确查，仅查出胡中藻所出“试题”及“偶和诗文三十六首”各一本，最后上呈销毁，才算过关。

其二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齐召南跋齐周华《天台山游记》案。陷入此案的谢济世因是广西全州人，清廷命广西抚衙追查。时任广西巡抚宋邦绥接旨后，即委按察使图桑阿带同署桂林府刘宗珙赶赴全州谢济世家查办。此时谢济世早已患病身亡，图桑阿等人便严讯其子，查抄其家。但并未获得与“齐案”有关的违禁之书，却缴获一部谢济世的诗文集——《梅庄杂著》。宋邦绥等人阅罢此书大为惊骇，认为“多乖谬怨怅之语”，不应流传，从而由原来的“齐案”又引出了另一起禁书案。宋邦绥将《梅庄杂著》的“狂悖之处”粘贴黄签上奏，清廷军机处为此批下“禁书”谕：“（谢济世）所作书词，既多谬妄，不应复任存留，该抚即飭令地方官，将已刷之书及原刊板片尽行查出销毁，毋使稍有疏漏。”

其三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尹嘉铨为父清谥并从祀文庙案。此案发生后，清廷列出尹嘉铨所著“悖谬书目”九十三种、石刻七种，通飭全国各属严加查禁。因为尹嘉铨籍贯直隶，又曾先后在山东、山西、甘肃等省任过司道，所以广西巡抚姚成烈在遵旨行事的时候，首先对尹嘉铨的同乡和原在山东、山西、甘肃等省做官的现任广西官员，以及曾在上述行省任过职并与尹嘉铨及其父同年、同官者的广西绅士，逐一调查是否存留有尹嘉铨的违禁之书，然后责成全省的府、州、县教官，广谕读书蓄书之家，按期缴交，不得存留片纸只字。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月，临桂县已故左副都御史吕焜家呈缴《尹会一年谱》一本、《健余语录》一本、《抚豫条教》一本、《健余奏议》二本、

《近思录》四本，已故大学士陈宏谋家呈缴《尹母年谱》一本、《尹会一年谱》三本、《健余剖记》一本、《健余尺牍》一本、《抚豫条教》一本、《北学编》三卷。此外，还有兴安县生员张宇仪等呈缴《挈矩编》三本，雒容县张梦弼禀缴《孝经列传》、《扬风录》、《闺范图》、《见善录》四种。当年十一月，广西抚衙将以上收缴的书籍悉数解京，咨送军机处销毁。

清代前期的文字之祸，对谬悖之书的厉行诛夷禁毁，在政治上造成一种地方官员对书籍可“危词邀功”，以求升迁的恶劣风气，使一些本身并无大碍的书籍，最终经不起清廷严苛的检查而遭禁绝。乾隆四十年（1775年）三月，广西巡抚熊学鹏从高熊徵“钞本文集”和陆显仁《格物广义》等二书中查出有字句违碍之处，既将其各句签出，上奏请予禁毁。清廷随后对所签各处批谕，认为高熊徵“钞本文集”还“不在应毁之列”，陆显仁的《格物广义》也“非讪诋之语，不能谓之悖逆”。但《格物广义》“多系剽窃前人讲学尘言，杂以一己拘虚之见，所论多踳驳不纯，留之恐贻误后学，其书板书本自应销毁并书名亦不必存”。这起乾隆年间直接发生于广西的禁书案，当时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后来被收入《清代文字狱档》一书中。

# 旧桂系时期广西出版事业概况

龙 谦

## 一、时代背景

从 1911 年辛亥革命到 1925 年，广西以陆荣廷、陈炳焜、谭浩明、沈鸿英为首的旧桂系军阀统治（其中陆荣廷军阀集团直接统治十年，其残部自治军混斗四年），前后十四年，称为旧桂系军阀统治时期。这一阶段，正是广西历史上新旧交替时期。

辛亥革命之前，维新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曾两次到桂林讲学和办报刊，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思想，这对地处祖国边陲的、闭塞落后的广西，在思想文化方面带来了新的气息。

接着，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黄兴，先后到梧州、桂林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在广西成立了同盟会广西支部。民主革命领袖在广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启迪了广西人民早期的民主革命思想和活动。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907 年——1908 年），孙中山指派黄兴、王和顺、黄明堂等在广西领导了钦廉防、镇南关、越南华侨三次武装起义，后有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的革命影响，迫使广西巡抚沈秉堃宣布广西独立和成立军政府，后来以陆荣廷为首的旧军阀集团上台，统治广西。民国九年（1920 年）陆荣廷叛变革命，孙中山下令讨伐，终使陆荣廷垮台，结束了旧桂系军阀在广西的统治。

孙中山还于 1921 年亲临广西，督师北伐，在桂林成立了革



命大本营，先后作了《三民主义是建设国家之完全新法》等几次讲演。他主张办实业、修道路、普及教育，提倡科学。在桂林期间还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上述民主革命领袖在广西的革命活动，推动了广西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展，也推动了广西文化出版事业的开展。

这个时期，广西有一批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如马君武（留日、留法）、黄朴心（留苏）、雷殷（留日）、雷沛鸿（留美）、盘珠祁（留美）、曾作忠（留美）、陆起华（留美）、徐松石（留美）、郑建萱（留英）、谢君起（留法）、韦永成（留苏）、粟寄沧（留日）、梁中岱、苏希洵（均留法）、周可传（留日）、黄同仇（留英）、黄楚（留苏）、邓家彦（留美）、廖延素（留日）、莫乃群（留日）、阳太阳（留日）、钟惠若（留日）、胡明树（留日）等。

这些青年学生向外国学习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同时也把这些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带回国内传播。特别是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冲击，人们的思想日渐开放，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从城市向乡村扩展，冲击了广西传统的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使马列主义开始在广西传播，更有力地促进了广西反帝反封建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废科举、兴学堂、办新学，推广白话文，普及国民教育，此时欣然兴起，这就促进广西出版事业的开展。

## 二、出版事业概况

广西现代出版事业，是从办报刊开始。经历相当的时间后，新闻报纸和书刊出版的专业分工渐渐形成。辛亥革命前后，自清末康有为在桂林办《广仁报》和官办的《广西官报》之外，广西出现了《漓江潮》、《独秀峰》、《粤西》等刊物。同盟会广西支部于宣统二年（1910年）9月17日创办了机关刊物《南报》（1911

年2月改为《南风报》),还出现了《广西教育公报》、《梧江日报》、《民铎日报》,还有立宪派办的《广西新报》;“五四”运动前,有进步的《广西日报》、《西江日报》、《民报》,有保守的《良知日报》、《公言报》、《指南日报》等。

“五四”运动时期,广西有一批青年学生在外省读书和工作,如黄日葵、谭寿林、林培斌、李征凤、韦杰三、韦拔群、李赤雷、周瑞琦、周公谋、雷荣璞(雷经天)等。他们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以同乡会、学友会等名义创办刊物,计有:

《桂光》(半月刊),北京,北京大学广西新期成会出版;黄日葵、谭寿林、党庆华、胡伟然、苏康甲为编辑,谭寿林为编辑部主任;

《铎声杂志》,北京,中国大学广西同乡会出版;

《新漓潮半月刊》北京,广西桂林道旅京学会出版;

《南太思》,南太思留京学会发行;

《友声》,北京,广西省南宁二中留京学友会发行;

《群言杂志》,广州,广西留穗学会出版,宁培英主编(该刊从1920年办至1937年,原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半月刊,刊名初为《群言》,后改为《群言杂志》、《群言月刊》);

《西江潮》,广州,广东高师广西同乡会出版;

《新桂半月刊》,新桂半月刊社出版;

《留穗公法学报》,广州,广西留穗公立法学会出版;

《桂风半月刊》,上海,广西旅沪同乡组织出版;

《苍梧花》,广州,苍梧留穗学会出版;

《容县留穗学报》,广州,广西容县留穗学会出版。

这些报刊内容多是宣传民主主义,介绍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列主义等进步思想,抨击封建保守的旧思想旧文化,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剥削,主张建立民主政治等言论。

上述这些报刊都在广西发行。如《桂光》半月刊每期印行

2000份，寄回广西梧州、柳州、玉林、藤县、岑溪、贵县、北流、平乐等地分销处出售。《群言杂志》在广西设分销处的有梧州、南宁、桂林、柳州、贵县、北流、玉林、陆川、平南、容县、藤县、岑溪、平乐等26处。

“五四”运动爆发时，广西最先起来响应的是梧州，其次是南宁、桂林、柳州等。1919年5月27日，梧州学生联合会救国团在大较场举行有几千名学生参加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北京、上海学联，都派代表到梧州进行宣传发动，帮助建立了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会。当时宣传马列主义的主要刊物《新青年》在梧州设有代派处。1924年12月26日团广西区委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提议给广西梧州、桂林、容县等六个学校图书室赠阅《响导》、《中国青年》杂志，六个学校中梧州占三个（即梧州中学、梧州师范书报室和梧州南华晨报社）。梧州成为“五四”运动时期广西学生运动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

“五四”运动后，广西各地的先进学生，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其宣传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出版报刊。先后出版的刊物有：

- 《救国晨报》，梧州，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会出版；
- 《救国旬报》，梧州，梧州学生救国会出版；
- 《妇女之光》，梧州，广西妇女联合会出版；
- 《梧州民国日报》，梧州出版；
- 《三月刊》，桂林，桂林学生联合会出版；
- 《周报》，桂林，桂林学生联合会出版；
- 《人钟》，桂林，桂林师范学生联合会出版；
- 《小朋友》，桂林，桂林师范学生联合会出版；
- 《校友会杂志》，桂林，桂林师范学生联合会出版；
- 《爱国报》，南宁，南宁学生联合会出版；
- 《南宁三民报》，南宁出版；

《晨报》，贵县，贵县学生联合会出版；  
《五月花》，玉林，玉林学生联合会出版；  
《玉林青年》，玉林，玉林学生联合会出版；  
《抚康杂志》，玉林，玉林中学抚康联合会出版；  
《绣江杂志》，容县，容县学生联合会出版；  
《学校周报》，蒙山，蒙山县立高等小学出版。

这些报刊，内容大多是“或介绍学潮，或砥砺学习，或鼓吹爱国，或攻击时弊”<sup>①</sup>，都有反帝反封建，民主爱国等进步思想，它唤起民众，催人奋醒。

旧桂系时期的出版印刷机构，除了晚清已有的桂垣书局、广西官书局外，广西又出现了一些出版印刷单位（当时出版、印刷、发行三者之间分工还不是很专，有的单位搞出版也搞印刷，搞印刷的也有经营出版发行的，书店也有既卖书也编印书的），这些单位经营范围还不专。据资料记载，这一段出版印刷机构还有：

桂林有南天出版社、桂林图书公司；

南宁有玫瑰书局（1919年）、华通书局（1918年）、进步书局编辑所（1922年）；

梧州有宣道书局（1910年）、新生商店（1918年）、九坊路大文堂、美华浸信会书局（1925年）、商业日报（1914年）等。梧州曾出了一本出国考察的图书《赴日考察报告》（作者陈树勋，曾任陆荣廷军政府的民政司长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版）等。

此外，县一级也出现了一些出版印刷发行单位和报刊，如：

玉林，新文化公司、德昌印务馆；

陆川，宾兴馆；

桂平，仁荫堂；

容县，同仁分社；

贵县，《贵县青年》；

贺县，《革命青年社》等。

随着新思想，新文化的传入，现代的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也引进了广西。如广西官书局已有了铅字印刷机、铸字机等。梧州宣道书局的印刷设备和部分纸张是从英国运来的。宣道书局印刷厂的印刷机器和其他设备的现代化程度及其生产能力，当时在广西的印刷厂中是最好的。最初的几名印刷技术工人也是从英国来的。由此看来，广西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印刷、发行业，在旧桂系时期已逐渐形成。

### 宗教出版的简况

在广西，宗教的出版，比较活跃的是梧州的宣道书局。宣道书局是美国基督教在广西办的一家出版、印刷、发行三合一的出版机构。该局地址在梧州市现大中路基督教礼拜堂，后曾搬至白鹤山顶（今梧州市少年文化宫舞厅）。负责人是翟辅民（译音），是加拿大籍英国人，出身贵族家庭。他是美国基督教宣道会派来中国的传教士，任宣道会会长。20世纪初来到广西。为了利用文字传教，他向美国宣道会提出在梧州开办宣道书局，得到教会同意。由他并雇了几个职员编辑印刷和散发宣传基督教的书报刊物。其中宣道书局印刷厂的部分机器，是他继承其父亲财产从英国运来的。

宣道书局主要印发《圣经报》（在梧州自编自印）。该报先是季刊，后是双月刊，月刊、半月刊，向全国及南洋群岛等地发行。同时还编印宣道小册子、传单等。该局编辑人员除翟辅民外，还有康阜尧、徐剑摩、罗节文、甘人等。

宣道书局的印刷厂负责人先是麦美伦，后是贝光道（译音）。该厂在1925年“五卅”惨案后挨火烧，损失惨重，因而结束在梧州的生产，迁往武昌。

宣道书局出版的宗教书籍中有：

《救主再临考》(翟辅民著, 1916年出版);

《摘录圣书》(翟辅民著, 1917年出版);

《罗马人书讲义》(翟辅民著, 1931年出版);

《圣经各卷讲义》及基督教义宣传的各种小册子等。

刊物方面, 现还有存书的有:

梧州浸信教会《季刊》, 共出至5、6期;

梧州浸信教会联合会《季刊》(据目录, 该刊从抗战前出至抗战胜利后)。

《真光杂志》, 从20年代起出版, 该刊主编、张镜开(又名张又开, 广西平乐人), 该杂志发行全国, 数量较大。

《梧州宣道会宣道消息》(今存第一卷第五期, 1924年10月出版)。

《宣道消息》(广西全省宣道会联合会出版, 存1928年出版的, 此刊当时至少每两月出一期, 经理赵柳塘, 编辑梁细杰)。

此外, 梧州基督教宣道会还办了一个“真光书楼”, 陈列各种宣道基督教的书刊, 供群众免费阅览, 也开设售书业务, 购书者亦售给。

### 三、书刊发行概况

广西的书刊发行, 据资料记载, 先于广西的书刊出版, 即广西还未编辑出版书刊之前, 广西已有书店发行外省编印的书刊。民国以前, 广西已出现销售书刊的书店。为存史备考, 把旧桂系时期以前广西的书店也予列述。

1911年以前, 广西各地已建有书店16家, 分布于9个市县(其中分布于四个市的占44.4%), 分布的情况是:

桂林5家: 经纶堂、翰文书局、石渠书局、经益堂、全文堂

南宁1家: 麟经阁书局;

柳州2家: 经文堂、翰文堂;

梧州 2 家：文明阁、宣道书局；  
玉林 1 家：翰文堂古今图书店；  
桂平 1 家：商务书局；  
宜山 2 家：尊经阁书局、余庆和书店；  
田东 1 家：志成书局；  
宾阳 1 家：长安书店。

这些书店出售的图书，以木刻版和石刻版书为主，如《三字经》、《百中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声律启蒙》、《幼学故事琼林》、《古文观止》、《朱子集言》、《唐诗三百首》等。这些书是当时私塾用来作课本的，发行量较多，范围较广。

戊戌维新以后，废科举，兴学堂，办新学。此后书店销售新书刊就更多。除发售刻版书以外，还从上海、广州、武汉、长沙等地进来一些新书——教科书及其他类书发行。

梧州的文明阁书店是同盟会香港分会派韦立权、谭剑英到梧州创办的。该店秘密发行了宣传民主革命的书刊。如《民报》、《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驳康有为政见书》等，为“驱除鞑虏，创立民国”大造舆论。

(文后附表一《晚清时期广西各地书店一览表》)

1912——1915 年，广西图书发行机构有所发展。全省有书店（书局、书馆、书阁、书庄）64 家，比清末 16 家增加了 49 家，增加了 2 倍多。这些书店中，有晚清时期办下来的书馆、书阁、书堂、书坊等。他们有既刻书又销售图书的，但此时刻印和发行的分工比较明显了。64 家大多是以销售图书为主业的店、局等。这 64 家书店，分布在 23 个市、县。除清末时期有书店的 9 个县、市外，新增加了 14 个市县有了书店，即增加了平南、横县、百色、容县、贵县、上思、龙州、恭城、荔浦、平乐、蒙山、武宣、忻城、北海。分布的市县比清末增加了一倍半。增加和分布的具体市、县是：

桂林，原有 5 家，增加 5 家，增加的店名是：商务印书馆、桂海书局、亚洲书局、桂林图书公司、世界书局；

南宁，原有 1 家，增加 4 家，增加的店名是：文海楼书局、文智书局、丛文阁书局、强华书局；

柳州，原有 2 家，增加 5 家，增加的店名是：李联昌、刘福记书店、兴盛书局、粹文书局、觉非石印社；

梧州，原有 2 家，增加 5 家，增加的店名是：通学书局、商务印书馆（支馆）、育新书局、中华书局（支局）、麟经阁书局；

玉林，原有 1 家，增加 1 家，增加的店名是：大同书庄；

宾阳，原有 1 家，增加 2 家，增加的店名是：明经堂、益友堂；

桂平，原有 1 家，增加 2 家，增加的店名是：广新书局、明新书局；

宜山，原有 2 家，增加 2 家，增加的店名是：袁正兴书店、福泰庆书店。

新出现书店的十四个县是：

平南 1 家，钟元记书店；

横县 2 家，文香阁、时中阁；

百色 3 家，文化书局、南华书局、启智书局；

容县 1 家，翰经堂；

上思 1 家，劝学所；

贵县 3 家，文华书局、德生局、本立堂书局；

龙州 1 家，振亚书局；

恭城 1 家，成春阁；

荔浦 2 家，叶德兴、蒋合记；

平乐 1 家，商务印书馆代销处；

武宣 1 家，振兴书局；

忻城 1 家，刘伦才书局；



北海 2 家，茂和书店、蔚华书局；

蒙山 1 家，德利书店。

清末时期已有书店的田东县志成书局，此时仍然存在。

新出现书店的 14 个县中，少数民族聚居的县是忻城、上思、武宣、恭城、龙州、百色、横县、贵县，占 14 个县的 57.14%。

这个时期有书店的 23 个市县中，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的有 13 个（田东、柳州、南宁、百色、横县、贵县、上思、龙州、武宣、忻城、恭城、宜山、桂平），占有书店市县数的 56.52%。

这 64 家书店中，专营图书 25 家，图书兼营文具的 26 家，图书兼印刷 8 家，图书兼文具纸张及教学仪器 3 家，图书兼瓷器文具 1 家，图书文具兼行医 1 家。因专营图书营业额小，营业利润不能维持经营人员生活，所以有一半多的书店同时兼营其他业务。

这一时期的书店经营规模最大的是商务印书馆，其次是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梧州商务印书馆人数最多时达 25 人，桂林分馆 9 人；中华书局梧州、柳州等支局均 15 人。这几家书店的营业额，以梧州商务印书馆为最大，每年销售额达三十万元以上（大洋，下同）；中华书局次之，每年约 20 万元以上；世界书局又次之，每年十多万元。此外营业额较大的还有文渊书局、大东书局、强华书局等几家。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家的总局都在上海，它们是外省书店来广西设分支机构最早的几家。也是广西民国时期民营书店最大的几家。商务、中华、世界和文渊几家主要是经营学校用的教科书和各类教学参考书为主，同时经销大出版社的图书。这几家基本垄断了广西教科书的市场。商务、中华、世界主要发行当时经教育部审订的本版中小学教科书。其中商务印书